目　录

回忆在湖南与叶剑英同志接触的日子……刘斐章（1）
抗日战争初期徐特立同志在长沙……黄英博（9）
记湖南《开明日报》……黎　澍（18）
忆塘田战时讲学院……邓晏如（23）
长沙文夕大火前后……席楚霖（41）
记张耀辰谈审判鄂悌经过……杨宙康（49）
长沙沦陷时期日伪活动见闻……罗崑林（53）
日寇在常德进行鼠疫细菌战经过……邓一韬（62）
一九四三年日寇在厂窖的大屠杀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办公室（69）
日寇在岳阳的暴行和血债
……吴健人、任伊平、刘又闻、吴荫泉（80）
记抗日战争中四次长沙会战……赵子立（88）
记第一次长沙会战……贺执圭（102）
第一次长沙会战亲历记……罗文浪、邹继衍（113）
记第七十四军参加第二、三次长沙会战……罗文浪（128）
回忆在芷江接待今井武夫……陈应庄（134）
芷江受降侧记……严怪愚（140）

参与程潜起义活动补述……程星龄（14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接管湘潭……杨第甫(151)
回忆湖南起义时的秘密电台……郑挹梅(165)
国民党三一四师积极准备起义及
　被击溃的真相……祝　凯(177)
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罪恶活动……沈　醉(191)
记益阳“双十惨案”……蔡杞材(194)

林修梅生平事迹……阮观荣、凌晋良、黎兴中(200)
记北伐军勇将龚宪……彭铭鼎(213)
梁焕奎事略……梁漱溟(219)
左宗澍小传……左宗濂(224)
国语拼音专家黎锦熙……黎锦明(227)

补正·订正·质疑·勘误

坚持晚节，其乐融融……朱伯深(230)
关于湘雅医学院史料的订正……凌敏猷(232)
陈延年没有参加八七会议……俞兴茂(233)
《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勘误表……(235)

回忆在湖南与叶剑英同志接触的日子

刘斐章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长沙大火前夕，周恩来、叶剑英同志都在长沙，同住在寿星街八路军办事处；起火以后，一同最后撤离火场。周恩来同志当时是南方局书记，抓全面；叶剑英同志的工作重点在军事方面。周总理主持长沙大火善后救济工作时，叶老到了衡阳，与国民党磋商如何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事宜。我们演剧八队在周总理领导下，参加了长沙大火后的救灾活动。

正值长沙突击救灾工作的紧张阶段，敌人放出和谈的空气，大家心里对抗战前途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阴影，议论纷纭。救灾工作结束后，我们演剧八队仍调回衡阳。当时已是严冬岁尾，决定在翌年春节，开赴湘北前线进行劳军演出。我们每天排戏练歌倒也紧张，但一接触到敌人放出和谈空气的事，不免忧心忡忡。按理，蒋介石应该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反共投降，可是他始终不愿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真正的全民抗战，现在敌人又以和谈来引诱，他会如何呢？国共合作抗日前途又将出现什么局面呢？正是这些回旋在脑海里的疑虑，使我们产生一种愿望，很想在出发湘北前线之前，得到党的领导同志给我们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这对我们坚持在国民党统治区宣传抗日关系是很大的。于是，鼓起勇气到八路军办事处说明我们的要求和愿望。

没有想到不久就得到办事处负责同志的通知，说叶剑英同志

可以给我们谈谈。我们十分兴奋，想早一点看到叶剑英同志。谈话的地点，就在我们住的成章中学。这是我们从长沙回到衡阳来的驻地，学校已放了寒假。时间在一九三九年春节之前。讲话内容只记得一些印象较深的片断。

叶剑英同志讲话一开始就分析了日军占领武汉后的形势。他说：不要只看到敌人气势汹汹的一面，他们占领了我国东北、华北、上海、太原，最近又占领了武汉。同时也要看到其虚弱的一面。敌人最大的问题是兵力不足，他们占领的地方越多，兵力不足的弱点就愈加暴露。敌人在华北、华东、华南都只能守着几个大城市和几条交通线。敌后广大地区，特别是农村，他们是无法控制的。这一点对我们很有利，我们可以到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牵制他们。还可以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壮大自己，削弱敌人，直到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

叶剑英同志着重指出，敌人是狡猾的，他们决不会坐等形势发展对他们不利。占领武汉以后，有主张急进的少壮派，要求迅速猛攻，但他们中掌权的，知道自己兵力不足，中国又不是一个小国，不断地组织大规模进攻是有困难的，至少是在当前短期之内，不喘一口气是无法连续发动进攻的。不久前，日军到达岳阳的前锋又缩回去了，现在坚持在新墙河一线按兵不动，就是这个道理。但这并不是说，敌人已经没有力量再向我们进攻了。

叶剑英同志还指出：不久前敌人故意放出和谈空气，条件是只要国民党反共。这是敌人这次搞和谈阴谋的核心。所谓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也是指此。但是，他们不会放弃军事。敌人最怕的是我们的民族团结，最怕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万一团结抗日的局面被破坏，那么敌人就可以不费多大力气侵占中国。但是，敌人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要抗战到

底的，决不会退回到过去那种不抵抗外侮，专门打内战的局面了。敌人要破坏我们的团结，我们就要加强团结；敌人要我们倒退，我们一定要前进。敌人玩弄和谈，我们就揭穿他，坚持把抗战进行到底。

叶剑英同志说：敌人阴谋搞“和谈”诱降，既可看出敌人的阴险狡猾，又充分暴露出他们的虚弱。敌人是被迫走向相持阶段的，但这种情况并不是静止不变动的。我们除了要揭穿他们的阴谋以外，关键还在发动群众，包括敌后的人民群众，要是能广泛深入地把人民群众发动起来，武汉失掉也不要紧，敌人玩弄阴谋也不顶事。真要相信人民，也决不会出现长沙大火这样的蠢事。

叶剑英同志最后要求我们说：你们就要到湘北前线去演戏劳军，宣传抗日，一定要宣传民族大团结，特别是国共团结。要宣传敌人有虚弱的一面，敌人是可以打败的，只要我们坚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大家都很兴奋，认为我们的演剧宣传，对加强团结，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是有作用的，大家信心十足。我们想到要带些党和八路军的宣传品到前线去，散发给抗日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而促进相互了解，增强团结。于是，又到衡阳八路军办事处去说明来意，要了一大捆《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带到了湘北前线。

听了叶剑英同志的讲话以后，我们就开赴前线工作。先是在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军部，随后在所属二十一师侯镜如部的三个团巡回演出。在师部时，侯镜如竟集合全师军官加上师直属部队，要我作一次关于抗日形势的报告。我们认为不可放弃这个宣传团结抗日的机会，决定讲解、宣传一下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把叶剑英同志对我们讲的话结合进去，结论是只要认真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加强民族团结，就可以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这个师有个旅长叫艾嗳，那次向我们索取《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最多，他要求系统地阅读党的报纸和刊物，并提出抗战结束后，国共是否还能合作等问题。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听说这个师起义了。

我们在前线工作了四十天，突然接到调回南岳的通知，派来接我们的敞篷大卡车也同时到达。当天集合到军部，第二天黎明出发，黄昏时赶到南岳，被安置在大庙对门的倪三泰客栈。正在分配床位时，来通知说，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的领导在镇上南濠酒家设宴为我们洗尘，要我们马上整队前往。南濠酒家也在大庙对门，离客栈不到一百米，是南岳镇唯一的酒家。我们走上楼，看见已摆好四桌酒席，这时才知道请我们赴宴的主人竟是叶剑英同志。原来在武汉失守之前，朱总司令曾坐飞机到武汉，向蒋介石建议，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牵制敌人。蒋介石想学八路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把自己的势力伸到敌后，这才有南岳游干班的创办。叶剑英同志被请来担任这个班的副主任，还带来了一个工作组。教官中有薛子正（解放后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同志，还带有电台，住在山下一个叫做“桔盈圃”的院子里，离南岳镇不远。游干班的主任是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宴会时没有来，由政治部主任陈烈作代表。事后才知道，这位政治部主任是汤部的中将副军长，过去参加过共产党，比一般的国民党军官在谈吐上、作风上大有不同。他是当时宴会真正的主人，也是我们调南岳工作的顶头上司。陈烈陪着叶剑英同志走上来时，我们又突然发现陪同的还有田汉同志。后来才知道原来是他出主意调我们到南岳来，要我们配合学员的学习，每周组织晚会演出新剧目，从文艺方面

进行宣传，协助叶剑英同志在南岳的工作。当时他是政治部第三厅专管艺术宣传的第六处处长。

这时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年轻的同志，一见到叶剑英同志就包围上来，问这问那，象是久别重逢的熟人，确切点说，应该是突然见到熟悉的老领导、老首长。叶剑英同志也把这批爱国青年看成是自己人，是自己的"兵"，也是相熟的朋友。大家有说有笑，他问我们到湘北前线演些什么戏？唱了些什么歌？士兵反映如何？同志们争着向他汇报。有的说，虽然是露天场子，收效还是很好的。士兵们都全副武装整队而来，席地而坐，安静得很。当演到激情的地方，突然爆发出一阵阵掌声；有时，还有人带头喊口号："坚决抗战到底！""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有的同志对叶剑英同志说，我们在前线还分送过《新华日报》。有一位军官问：我们打完日本，国共还能合作吗？这时田汉同志走过来对我说："要注意一下环境，你们不要把那位中将主任冷落在一旁。"我连忙拉了几个年纪较大的同志和陈烈坐在一桌。那边包围着叶剑英同志的年轻人，还正在兴致勃勃地询问延安的文艺生活，又谈到陕北民歌，说这些民歌和抗日紧密联系起来就是好……我们这边，陈烈说："请你们来不是把你们看成是个剧团，单只演戏。我们是请你们来当教师的，是当先生的。"我们想，这人好厉害。田汉已关照我，我们今后要在南岳工作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一定要和陈的关系搞好，何况我们今后将直接归他领导。于是，我连忙说："我们调南岳工作，今后在您的直接领导下，请您随时多多指示。"

当宴会快要结束时，突然有个四川口音的青年军官（很可能就是政治部的）提议要我们女同志唱个歌子。提议唱个歌，本来也没有什么，可是那人的态度、口气都使人联想到大官阔人举行宴会，要戏班子的旦角清唱消遣，大家很不高兴，赌气不理。一时

间气氛紧张。就在这时候，田汉同志突然站起来，笑着说："我来唱一个。"他唱的是京戏《秦琼卖马》，音调很高昂，加上一点英雄落魄的苍凉，很有韵味。大家情绪好转。正在这时，只见叶剑英同志也站起来，很自然地说："你们不是想听听陕北民歌吗？我来唱一个。"这一来大家的情绪更加活跃了，热情地鼓着掌。叶剑英同志那天穿的是一身灰布军装，腰间系着一根细细的皮带，脚穿马靴，身体健壮英俊，看去不到四十岁。他一只脚踏在一条长板凳上，就唱起来。

我们队的同志都没有想到，田汉和叶剑英同志会突然自己提议自己先唱起来，不但打破了僵局，而且态度很自然。这件事本身就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这是一个在国民党统治区如何搞好统战工作的示范啊。搞好关系是为了更好地团结抗战，而且叶剑英同志唱的还是经过改写宣传抗战的陕北民歌《开荒》："开荒哦，开荒，前方的战士要军粮。……"他平时说话本有点广东口音，但唱起歌来一点广东腔都没有了。

歌声才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特别是八队同志要求他再唱一个。叶剑英同志也不推辞，接着又唱了也是经过改写的《延水谣》："延水浊，延水清，情郎哥哥去当兵，……"

又是一阵掌声、欢笑声，宴会变成了文艺晚会，叶剑英同志提议，欢迎"八队同志唱一个"。（叶剑英同志以后看见我们，不管是多数人在一起，还是只有个别人，总是喊"八队的同志"。我们队的同志在叶剑英和田汉同志的鼓舞下，也欢欢喜喜地集体唱了《红缨枪》等抗日歌曲，

在洋溢着欢笑的热烈气氛中，使人忘记了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宴会结束时，都有些依依不舍的情绪，大家挤着争着去送叶剑英同志和田汉同志下楼，有同志在我耳边说，再请叶剑英同志

来给我们作次报告吧，这时叶剑英同志的声音掩盖了其他同志的讲话，他说："下回要看你们的戏了。"

不久，我们参加晚会，组织第一次演出，演的仍是独幕剧，根据《最后一计》改的《英勇牺牲的杨队长》和其他节目等，演出结束后，叶剑英同志突然来到后台，他边走边说："八队同志们，你们的戏演得好啊！"大家兴高采烈地围上来，叶剑英同志的手臂搭在叶向云的肩上，说："你这个英勇不屈的杨队长演得不错。"叶向云对他说："同志们想请您再给我们讲次话。"他笑着低声回答："不行啊，这可不是我不肯讲。"叶剑英同志离开后台时，边走边高声说："再演戏时一定要告诉我，我还会来看的。"

我们队上有个王平，喜欢收集抗战资料，他还到过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采访过，带回许多实物和照片。我们在南岳，为了揭发汉奸汪精卫，还利用这些资料，开过对比的展览会。王平那时不知道叶剑英同志已和叶向云说过那番话，又跑去找叶剑英同志，请他再给我们作次报告。叶剑英同志耐心地对他说："八队同志，你们不要对我太亲热了，这对你们不利啊！我这个共产党是他们请来的。可是你们不同啊！要注意一下环境，注意一下工作方式。对吗？"王平回来对大家讲了叶剑英同志的这番话。大家回忆，到南岳来的第一天宴会上，是叶剑英同志和田汉同志带头打破僵局唱起陕北民歌和京戏，这次又提出要我们注意工作方式。大家经过一番议论，认识都有提高，懂得了既要生动活泼地打开局面，又要随时提高警惕。从那以后，我们再没有和叶剑英同志公开接触过。可是我们演戏，他总是来看的，特别是从延安移植来的，内容是改造旧军人、搞好军民关系的《流寇队长》，他看了很高兴。还有前面讲过的那次小型对比展览会，他也看过，间接地传来了他对我们的鼓励。这都是调南岳工作头半年的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往后，就再也没有见到或间接地得到叶剑英同志的消息了。南岳游干班也在逐渐地变化，传说第五大队是专门训练到敌后搞特务工作，监视共产党的抗日活动的。我们在南岳的工作已不象最初那么单纯，顺利，那么热情高涨。回忆那时叶剑英同志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给了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青年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抗日战争初期徐特立同志在长沙

黄英博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徐特立同志和王凌波同志来到长沙，住在犁头街口一家名叫临湘的小旅店里。徐老是我在长沙师范肄业时最崇敬的老师，对我的政治倾向早有所知；王凌波同志则是我一九二九年在上海提篮桥坐牢时的难友，我们都是因从事地下工作而被捕判刑的。由于以上的关系，我参加了八路军驻湘办事处的筹备工作，并担任秘书，负责协助徐老接待宾客，处理来往文书，作讲演记录，等等。为了便于工作，有一段时期，我和徐老同住一室。因此，对徐老在湘任八路军（后改为第十八集团军）驻湘代表期间的活动情况，比较了解。

（一）

徐老由陕北回到家乡长沙时，正值上海失守，南京吃紧，京沪一带人士纷纷向后方撤退，长沙一时车水马龙，拥挤不堪。许多人对战局前途、民族命运十分担忧。因此，每天到八路军驻湘办事处找徐老的人络绎不绝。综合来访者向徐老提出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1）抗战将来如何发展？结局怎样？（2）共产党的态度究竟如何？是真和国民党合作抗日，还是权宜之计？（3）国共合作后，是否会再次分裂？对此，徐老总是根据党中央号召

抗战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精神，耐心细致地给予回答："现在对日抗战，是一场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只要举国上下紧密团结，组成坚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抗战坚持到底，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我们共产党是坚决抗日到底的，是真诚讲团结的，这一点是不容怀疑的。现在大敌当前，'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至于国共合作后，是否再次分裂，我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不会循环的，而是不断前进的。人民是不会同意分裂的，谁再搞分裂，只能自取灭亡！"这些精辟而诚恳的答复，使许多来访者消除了疑虑，对抗战前途增强了信心。

由于到办事处拜访徐老的人与日俱增，这就引起了反动派的极大不安。他们迫于形势，表面上赞成联合抗日，可内心对共产党还是极端仇视，因此，时时刻刻都对徐老进行监视和干扰。省会警察局派出若干密探，轮流来办事处侦察徐老的行动。有的在周围守候观察；有的混在来访者中，装着认真求教的样子，提出一些带有敌意的问题。例如："你们共产党讲抗日，究竟能出多少兵力？""你们用梭镖、鸟铳，也能战胜日本吗？"有的还故意试探徐老，说："我想去延安，可以吗？"对此，徐老都坦然作出回答，明知来者不善，还是尽量不使对方难堪。我们有些不理解，他告诫我们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党真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没有半点阴谋，有什么不可以同他们谈的呢？依我看，他们回去向主子汇报，正好达到我们宣传联合抗日的目的。"

经过一段时间，反动派对徐老光明磊落的态度和理直气壮的言辞，感到无稽草可捞，因此，对他的戒备，也就稍有松懈，不象以前那样严密了。

（二）

徐老当时已六十出头，但精力却非常旺盛。每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四至六小时外，其余时间不是接待来访者，便是阅读和写作。冬天，他从不在火炉旁坐一会。大家劝他歇一歇，他也只在火炉旁烘烘手就走了；夏季，他不放下工作乘凉，汗流浃背时，也只拿蒲扇摇几下了事。有时我们忍不住问他不怕冷热的原因，他说："一个人做事要精神集中，全神贯注，这样就会既不感到冷，也不感到热。"据我所知，徐老在任八路军驻湘代表期间，他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协助恢复湖南自"马日事变"后被破坏的党组织；与国民党省政府交涉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发展进步力量，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

这里谈谈徐老宣传抗日救国的活动情况。当时不论是学校或其他单位邀请他去演讲，或者是对一些人的谈话中，他总是全力以赴，认真地抓住时机，理直气壮地阐述团结抗日的重要性。他在讲演和谈话中，经常有这样一段话："如今对日作战，单靠国民党一党不行，单靠共产党一党也不行，尤其是单靠军队更不行。必须联合各党各派的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武装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绝对不许动摇、妥协，而要坚持持久战。"同时，他还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他常说："有人认为我们的武器不如敌人，我们的部队素质也不如敌人。这场战争打不赢，难免不亡于日本。我认为这种观点对抗战是极端有害的。我们虽然没有大量的现代化武器，但我们是在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可以夺取敌人手中的武器，在战争中壮大自己。至于有人认为'日本

帝国主义没有煤，没有铁，我们只要坚持六个月，日本就会崩溃，那也是不合乎实际的。敌人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是事实，但并不象有些人想象的那么严重，如果我们过于乐观，对于持久抗战也是极其不利的。”

徐老在长沙公开讲演，除首先在银宫电影院（现改新华电影院）公开讲演一次外，我记得还有如下几次：应联大（西南联大前身，迁湖南时设在韭菜园原圣经学院内）邀请两次；应中央戏剧学院、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学联妇联等邀请各一次。在银宫讲演的题目是《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形势》，时间大概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此外还应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邀请，每星期三去讲演一次，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徐老每次讲演，会场上总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讲完后，总有不少听众不愿离去，有的挤上台，围着徐老请教各种问题。徐老总是耐心而详尽地答复，直到对方满意为止。有时徐老出了会场，仍有不少人同他边走边谈，十分亲切。

除了在大会上讲演以外，徐老还经常应邀参加各界举行的小型座谈会。如学术界的薛暮桥、李仲融、杨东莼；文艺界的张天翼、邵荃麟、曹禺；妇女界的罗琼、王庚琪、梁淑德、孟素等，都曾邀请徐老参加过他们组织的各种座谈会。至于个人的约会那就更多了，一般都在晚上进行。徐老总是按时赴约。黄炎培由沪来长后，当即邀请徐老到他住处深谈两次；张西曼、赵君迈等路过长沙，也都邀徐老作过多次长谈。此外，专程来长拜访徐老的人也不少，如著名生物学家、中山大学生物系主任董爽秋教授，曾与恩谈多次后，请求徐老介绍他和儿子去延安参加革命。徐老认为他在中大任教对人民更有利，就进行了劝阻，只同意把他的儿子董玉清送往陕北（学习后参加工作时牺牲）。

当时有不少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要求徐老推荐去延安参加抗日工作。徐老把这一情况向延安作了汇报。延安指示要慎重吸收这批力量。徐老根据中央指示，积极而慎重地吸收了一批有志青年，设法把他们送到了延安，在短训班学习革命理论。

徐老还注意支持进步报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田汉主办、廖沫沙主编的《抗战日报》上的重要社论，都是经过徐老过目、修改后才发表的。徐老还亲自为该报撰写过多篇社论和专文，如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淞沪抗战的教训与国共合作》；同年十二月发表的《抗战到底与自力更生》等。经常向该报投稿的青年胡大愚、封凯等，也常将稿件送请徐老审阅修改。黎澍、潘开茨、杨荣国等创办的《观察日报》，也曾得到徐老的鼓励与协助。该报创刊时，黎、杨曾多次向徐老请示办报方针和报型问题，徐老当即将党中央的抗战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交给他们，还关切地问他们办报经费和印刷困难等问题。当听到都已有着落时，他才放了心。报纸出版后，逐日送徐老一份审阅。该报的重要社论和其他重要文章，大都经过徐老过目修改。中苏文化协会从南京迁来长沙后，根据徐老建议，办了一个名叫《中苏文化》的刊物，撰稿者都是一些进步人士，如翦伯赞、吕振羽、张天翼、萧敏颂等。徐老也为该刊写过好几篇文章。此外，徐老对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和其他一些群众组织以及进步人士创办的各种刊物，都曾给予积极支持。"妇女抗救会"罗琼等主编的《湖南妇女》，吕振羽等主编的《今天》，徐老都亲往参加过编辑会议，有时还撰文支持。

在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同时，徐老还鼓励和支持各界救亡活动的组织工作。为了适应当时文化界广大人士的要求，在地下党的策动下，首先成立了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这个组织

的建立，是经过一番激烈斗争的。在成立会上通过宣言和组织章程时，就出现了意见分歧，敌我阵容分得一清二楚。当选举理事干事时，国民党省党部派来不少文化特务蓄意刁难，但他们的阴谋并未得逞。这与徐老的积极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

当时湖南关押了不少革命同志，徐老到长沙后，即找省政府主席张治中交涉释放“政治犯”。张虽满口答应，但拖拖拉拉，执行不力。徐老反复耐心交涉，张才应允将被关押人员名单交由省政府下令释放。可是下面又层层设卡，释放一个同志，不知要费多少口舌，排除多少干扰。可徐老不厌其烦，常说：“这也是一种斗争嘛！当然不比战场上的战斗，那种战斗靠流血，这种战斗靠耐心，要耐烦同他们交涉，否则，一拖就完了。”

在交涉释放“政治犯”的斗争中，还有另一种情况。对一些“重要犯人”，国民党方面总是推诿说“没有此人”，“要查查看”，“可能改了名字”，等等。尽管如此，经过徐老耐心说理，加之迫于舆论压力，大部分同志都得以出狱。如原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军二十一师参谋长乔信明同志等三十多人，从地方监狱押到长沙陆军监狱后，徐老立即去探望，代表党和八路军慰问他们。并向他们讲述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新形势，要他们耐心等待恢复自由。这些同志都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徐老立即将乔信明等同志的名单提交省政府，要求根据两党协议，一律从速释放。但省政府没有马上执行，而是将他们移往桃源县监狱关押，并传说有被杀害的可能。徐老再次赶往省政府据理力争，他们才不得不指令桃源县将乔等释放。又如王自申（解放后曾任中南政治学院院

长）、黄涛、李服波等同志，都是经过徐老多次交涉获释的。先后被营救出狱的同志有数十人。大多数同志因倍受折磨，疾病得不到医治，长期缺乏营养，出狱后都须经过一段疗养，才能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徐老对他们十分关怀，总是多方慰勉、照顾，这些同志感到了党的温暖，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四）

徐老在工作之余，还刻苦学习，坚持不懈。他常把自己看过的，有教育意义的书刊或文章推荐给我们。他在百忙中除阅读毛主席一些单篇文章外，还阅读了不少经典著作，如《资本论》等。《联共（布）党史》也是他经常翻阅的书籍。我当时读了一部都德《世界政治》，徐老看到后，拿去读了几遍，对书中的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同意的观点，就在上面圈点，不同意之处，就在天地头上作眉批。徐老还重视对革命理论的探讨，撰写过一篇哲学论文——《关于矛盾统一的几个要点》。这篇文章，曾一再修改，交由陈碧莹（我的爱人，当时在办事处任收发）誊正，先后达五、六次之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联合旬刊》上发表。可见徐老对读书、写作，是十分认真而又善于独立思考的。

（五）

徐老在长沙的生活十分简朴。当时他穿的是从延安穿来的那套灰布棉军服和另外两套单衫，里面是一件棉纱衣。吃饭时，总是大家都上桌了，他才放下工作来就餐。并不止一次地对大家说："以后不要等我啰，我晚来一点吃是一样嘛，会吃饱的。"徐老最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